

经济全球化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李文溥

(厦门大学 经济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国际经济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它使世界范围的生产、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全球化抽走了民族国家实行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础,使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经济全球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把经济政策的落脚点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把提升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增加有效供给,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首位。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宏观经济政策;供给管理

中图分类号:F114.41;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0)03-0005-08

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世纪之交国际经济发展中引人瞩目的现象。它不仅引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系列变化,而且对各国国内经济政策颇具影响。本文从三个角度——生产与贸易、投资、金融——分析至9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发展程度,探讨它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影响。

一、生产与贸易全球化

商品交易的国际化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市场的发展状况,以及民族国家经济卷入国际化生产的程度。

(一)贸易比重。国际贸易额及其占世界产出的比重从量的角度反映了贸易的全球化程度。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世界贸易的增长大大快于产出的增长。1820年到1992年,世界人口增长5倍,人均收入增加了8倍,世界收入增加了40倍,而世界贸易量却增加了540倍。[1]1990-1997年,世界GDP增长了39.65%,而世界出口却增长了62.33%。[2]相应地,出口在世界产出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50年不过6%,1973年增至12%,1997年已经上升至21.05%。

贸易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全球化程度。考虑到现有生产与需求中有相当部分不可能全球化,如某些服务生产;此外,GDP还包含了政府等公共部门“产值”在内;现有GDP中

收稿日期:1999-11-22

作者简介:李文溥(1953-),男,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又有部分是以国际化方式生产的,例如跨国公司的当地子公司生产并在当地销售部分,因此,社会生产中可以全球化部分的实际全球化程度显然高于现有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比重。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估计,目前约 1/3 的世界生产是以国际一体化方式进行的。

(二)贸易地域结构。生产与贸易全球化的另一方面,是卷入全球化生产与贸易的地域范围及结构。1913年,四个世界最大贸易国美、德、英、法的出口额占了世界出口总额的 45%,1968年,这四国所占比例下降到 38%;1992年,四个最大贸易国美、德、日、法——日本取代了英国——的比重又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出口比重上升。1968年,世界上有 19 个国家进口各占世界进口总额的 1%以上,其中只有 3 个发展中国家,占 19 个国家的 16%;同期有 17 个国家出口各占世界出口总额 1%以上,其中也只有 3 个(占 18%)发展中国家。1992年,前者上升到 21 个国家,其中 7 个(占 33%)是发展中国家,后者上升到 25 个国家,其中 10 个(占 40%)是发展中国家。[1]全球化日益地把世界各国卷入一体化经济漩涡之中。

(三)贸易产品结构。贸易产品结构是反映生产全球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的形式及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资源禀赋差异说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而经济全球化使新的国际贸易形式如部门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公司内贸易(Intra-firm Trade)以及服务贸易(Trade in Services)的比重不断上升(见表 1)。

表 1 OECD 国家产业内贸易指数^{[3](P30)}

	1970	1980	1990		1970	1980	1990
英国	53.2	74.4	84.6	加拿大	52.1	51.5	60.0
法国	67.3	70.1	77.2	意大利	48.7	54.8	57.4
奥地利	60.4	73.2	75.2	爱尔兰	48.2	55.1	56.9
西班牙	41.7	48.9	74.2	希腊	32.4	28.3	50.5
比利时/卢森堡	61.4	67.5	72.8	葡萄牙	39.8	39.5	49.2
德国	55.8	56.6	72.2	芬兰	29.4	37.8	45.7
美国	44.4	46.5	71.8	挪威	52.3	42.5	41.9
荷兰	63.4	60.5	69.8	土耳其	6.7	12.5	34.6
瑞典	52.3	58.2	64.2	日本	21.4	17.1	32.4
丹麦	55.0	54.8	62.2	澳大利亚	20.7	21.6	30.5
瑞士	52.5	59.8	60.2	新西兰	10.6	16.3	25.9

70年代初期,公司内贸易不过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1/15,90年代初上升到 1/3。[4]而美、日、英在 80年代中期就达到了 1/3 左右。[1]1993 年美国、法国、瑞典的企业内出口占本国出口的比重分别为 36%、34%、38%。[5](P192)

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如银行、保险、金融服务、广告、法律服务、建筑、运输、通讯以及随着通讯及信息技术发展而成为新的可贸易服务的数据录入、软件设计、计算机服务等,也迅速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 - 1998 年,世界服务出口额增长了 252.78%,年递增

7.25% ,比同期的货物出口增长率高 1.86 百分点。

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以及服务贸易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是生产全球一体化的结果,说明生产正在取代贸易成为世界经济联系的新纽带。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方式正从传统的国际贸易转向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国际价值形成过程。

二、投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投资全球化。国际直接投资(FDI)在 80 年代迅速增长,90 年代初因受经济周期影响而回落,但自 1993 年起再度迅速增长。FDI 迅速发展,使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主角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运行方式。

与生产相比,目前投资全球化程度相对较低。到 90 年代中期,FDI 占世界资本形成的比重还只有 5% 弱。在资本流出比重较高的西欧、北美,流出资本不过占投资总额的 7.6%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流入资本占国内资本形成比重较高,也不过是 7.6% 。[6]但是,FDI 增长速度十分惊人。1981 - 1985 年,FDI 流量年均增长速度不过 3% ,1986 - 1990 年就剧增至 23.6% ,1991 - 1995 年,虽受经济周期影响,仍然达到 20.1% ,1997 年则增长了 18.6% ,因此,1997 年 FDI 占世界资本形成的比重就达到 7.42% 。[7]不仅 FDI 流量迅速增长,而且相关指标,如 FDI 存量、跨国公司国外销售额、专利转让费收入等,都比国内总投资、GDP、商品及非要素服务出口等增长更快。

其次,FDI 基本上是生产性投资,而且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因此,它对各国社会生产、就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它在固定资本形成中的比重(见表 2)。

表 2 外国企业在 G7 国家制造业中的生产及就业份额[3](P36)

	生产 1980	生产 1991	就业 1980	就业 1991
美国	3.9	14.8(1992)	5.1	12.3(1992)
加拿大	50.6	49.0(1989)	37.8	38.0(1989)
日本	4.6	2.8(1990)	1.6	1.2(1990)
法国	26.6	26.9	18.5	22.1
德国	15.7	13.8(1992)	9.0	7.2(1992)
意大利	19.2	22.3(1988)	15.8	17.2(1988)
英国	19.3(1981)	25.5	14.9(1981)	17.2

在 G7 国家的有些产业中,外国公司在当地子公司的生产份额甚至高达 85% (见表 3)。

根据中经数据 CEI date 99 - 5 - 12 中有关数据计算。

表3 G7 国家外国公司具有最高生产比重的产业部门及比重[3](P39) (%)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	美国	日本
1987	1990	1990	1989	1990	1989	1989
汽车	计算机	计算机	计算机	计算机	其他制造业	化学
85	74	82	78	78	30	11
化学	化学	化学	电子	汽车	非金属制品	机器设备
76	45	43	55	60	29	2
非金属制品	电子	食品及饮料	化学	化学	化学	基本金属
55	31	23	30	36	27	1
机器设备	非金属制品	汽车	食品及饮料	电子	基本金属	其他制造业
44	26	24	15	26	22	0.6
其他制造业	机器	基本金属	机械	基本金属	电子	纸张及印刷
35	28	21	12	21	19	0.5

再次,从全球范围看,FDI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在固定资本形成中的比重。FDI主要由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公司的强大经济技术实力决定了尽管跨国投资在世界总投资中比例不大,但是,对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投资额。联合国《1995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跨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开支占当今世界民用研究与开发开支的75% - 80%,世界最大的700家工业企业(其中多数是跨国公司)的发明专利占世界商业专利发明的50%左右。全球跨国技术转让和技术使用费转移中,4/5发生在跨国公司体系内部。跨国公司不仅通过其在境外的25万个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活动,使世界的经济活动从50 - 60年代的以国内生产、国际交换为特征的贸易型国际分工,逐步地向以国际生产、跨国经营为特征的FDI主导型国际分工方式转移,而且通过其非投资跨国经营活动,如分包、许可证和特许经营,打进境外商品劳务市场,获得生产要素,组织国际化生产,进一步地扩大了全球化生产的规模和范围。1992年,广义国际化生产的国际市场销售额高达70000亿美元,是世界直接贸易额30000亿美元的233.33%。

投资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跨国投资对世界生产、交易、金融活动深远的影响,使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学者们特别重视投资全球化,他们认为在改变世界经济联系方式上,投资与贸易不可同日而语。John H. Dunning等甚至因此区分了经济全球化的两个不同阶段:国际化(Internationalisation)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8](P12)

三、金融全球化

生产的全球性分布及为全球性需求生产,要求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筹资,在全球范围内调度、运用资金。投资者因此也获得了新投资领域,投资对象不再局限于本国企业。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的全球化,导致了金融全球化。跨国资金流动剧增,其数量与增速使贸易、投资相形

见细。金融全球化目前主要体现在外汇交易、银行贷款、金融资产与政府债券四个方面。

(一) 外汇交易。全球化金融活动目前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史前形式——民族国家经济时代的金融体系及制度框架——的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克服不同民族货币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分割和资金流动障碍的外汇交易的发展成为现阶段金融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973年,国际金融市场平均外汇交易量是150亿美元/日,1983年上升到600亿美元/日,年递增14.87%;1992年达到9000亿美元/日,[1]年递增35.11%;1995年4月更增至12300亿美元/日,[9]1973年,外汇交易量对世界贸易量之比不过9:1,1983年上升到12:1,1992年剧增为90:1。1992年世界生产不过640亿美元/日,出口是100亿美元/日,而日外汇交易量却分别是前二者的14倍和90倍。[1]外汇交易原本是满足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需要的金融服务,但是,由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不匹配,却成为了金融投机家呼风唤雨、投机获利的工具。原本服务于生产、贸易、投资的外汇交易脱离了真实经济运行的需要,异化为目的本身。据研究,全球外汇交易量中,为直接投资和商品交易筹集资金所占比例仅在5%至7%之间。[1]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巨额外汇交易使各国央行对汇率的调控力量急剧下降。1992年,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仅6930亿美元,只是当年全球外汇日交易量的77%!靠个别国家央行的外汇储备稳定汇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1]

(二) 银行贷款。经济全球化必然使资金流动全球化,它使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及跨国贷款量剧增(见表4)。

表4 跨国贷款对世界产量、贸易、投资的比率[4](P17) (%)

	1964	1980	1991
1. 跨国净贷款/世界产量	0.7	8.0	16.3
2. 跨国净贷款/世界贸易量	7.5	42.6	104.6
3. 跨国净贷款/世界总固定资本形成	6.2	51.1	131.4

跨国净贷款增长快于世界产量、贸易及资本形成的增长,国际银行间市场增长更快,1970年到1990年,跨国的银行间债务每年递增13.33%,从4550亿美元增长到55600亿美元,大约是跨国净贷款的两倍。

(三) 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国际市场与外汇交易市场、跨国贷款相比,起步较晚,但发展历程相似。1980年,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国内外居民之间的债券和股票交易总额都不及本国当年GDP的10%,而到1993年,这一交易总额已分别是美、德、日当年GDP的135%、170%、80%。在美、英、日各种基金的资产中,外国债券和股票的比率也从1980年的0.7%、10%、0.5%分别提高到1993年的6%、20%、9%。IMF估计,1992年,全部可交易证券的跨国产权已经高达25000亿美元。[1]据世界银行计算,1993年,全世界社会生产产值为231000亿美元,而当年年底尚未结算的世界范围有价证券交易额估计超过600000亿美元,约是前者的2.6倍。[1]

国际证券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与FDI是两种不同的国际投资渠道。前者起步较晚,但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表5 国际投资状况*占 GDP的比重[10](P107)

(%)

	1980	1985	1990	1995		1980	1985	1990	1995
美国					英国 #				
直接投资	13.6	9.2	10.8	14.9	直接投资	13.7	19.1	22.8	30.5
证券投资	2.2	2.7	4.0	12.2	证券投资	7.9	27.1	33.3	47.4
股 票	0.7	1.0	1.7	6.9	股 票	5.5	15.5	19.2	30.6
债 券	1.5	1.8	2.3	5.3	债 券	2.3	11.7	14.2	16.8
日本					加拿大				
直接投资	1.7	2.8	6.0	6.3	直接投资	8.3	11.0	12.6	18.3
证券投资	1.8	9.2	16.8	17.9	证券投资	2.7	3.6	6.8	12.2
德国 #					股 票	2.5	2.7	5.3	9.4
直接投资	3.1	4.3	6.0	7.3	债 券	0.3	1.0	1.5	2.8
证券投资	1.9	5.9	10.3	13.0					

* :仅包括私人部门; # :不包括银行部门的生产

1980年,除日本外,美、德、英、加四国的国际证券投资都显著低于FDI,但是,到1995年,5国中已有3个国家的国际证券投资超过FDI,美国和加拿大则二者比例相近(见表5)。国际证券投资后来居上,是由于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全球经济竞争扩大及深化。技术开发高投入及结果不确定性使产品市场风险上升,预期收益率下降,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扩大了国际金融的投机的空间。不同渠道资金收益率的消长,促使资金从投资转向投机。这是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资金逐渐地从长期的FDI转向短期的、具有更多投机性的股票及债券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政府债券。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使政府预算可以不再像封闭经济时代那样完全依靠本国财源,而是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财政资金。从1980年到1992年,政府债券为外国债权人持有的比例,法国从1%上升到43%,英国从9%上升到17%,德国从10%上升到27%,美国基本稳定,仍然保持在20%左右,但绝对数也大大上升了。[1]

通过国际证券市场筹资占政府财政资金来源比例上升,有双重意义。除金融全球化外,更意味着财政这个向来代表着国家经济主权的职能,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难以自我维持,不得不一步步地国际化。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国际证券市场筹集财政资金,是由于跨国公司获得了在全球范围配置生产力的自由,政府却不得不为吸引资本而竞相为之提供各种优惠——这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发生在发达国家。它既降低了政府的赋税能力,又增加了预算需求。乌布利希·贝克教授指出:“生产国际化向企业提供了两种战略好处,一是在昂贵劳动力和便宜劳动力之间进行一种全球性竞争,二是各国的纳税标准和税务监督人员相互竞争,相互拆台。”于是,“企业主发现了点石成金的秘诀。新的咒语是: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加上没有税收的资本主义。政府从公司税、企业利润税中所得收入从1989年至1993年下降了16.8%。

它们在国家全部征税收入中所占比例几乎减少了一半(从 6.4% 下降到 3.0%)。与此同时,企业利润率却经常以超过 10% 的比例增长。”^[11]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际金融市场,靠举债维持财政平衡。而生产领域风险上升,使资金也趋于选择国家债券作为投资对象。约阿吉姆·比朔夫指出:“国际范围内活动的金融资本的增殖在很大部分上来源于国家预算和社会保险机构所承担的债务。”^[11]即跨国金融资产增加与国际性政府债券增长是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一枚硬币的两面。

金融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深远的。其中,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最大影响是:使财政货币政策,尤其是以需求管理为目的的反周期财政货币政策日趋失效,社会福利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也面临着全球市场机制的有力挑战。

四、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它已经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进一步深刻影响中国在 21 世纪的发展前景。面对它,无非两种态度:拒绝它,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或者接受它,对外开放,投身于全球化的经济分工与竞争之中。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前者意味着边缘化,而后者,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实际上是不平等竞争,边缘化的威胁仍然存在。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争取战略主动?国际经验表明,关键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面对掀天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实行开放战略的我国必须以供给管理为出发点,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其原因是:

1. 经济全球化抽走了民族国家实行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础。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需求与供给不再局限于本国疆界之内,而是逐渐成为整个国际市场供需的一部分。如果说相对封闭的民族国家经济体系存在着依靠政府创造需求并激活供给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在全球化时代,面对汪洋大海一般的全球市场供需,个别国家的财政资源显然是沧海一粟。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经济的需求必须靠它在世界范围的有效供给来创造,即不是有效需求创造有效供给,而是有效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政策制定者必须把国内经济政策的落脚点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把提升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增加有效供给,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首位。这是一国经济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门。

2. 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际资本,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管理权威受到严重挑战。任何妨碍资本竞争力发挥,限制资本对其他生产要素支配权力的政府管理措施,都可能导致内资外流,外资止步。各国的经济政策、经营环境处于某种程度的横向比较之中,各国经济政策当局之间出现了某种微妙的竞争关系。这是相对独立、封闭的民族经济体系时代政府所未曾面临过的。外部环境的变化,限制了民族国家政府在国内实施经济政策的空间。一些过去认为是纯粹的国内经济政策,例如收入分配政策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也逐渐成为需要国际协调、合作解决的问题,忽视全球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可能南辕北辙。

3.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宏观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目前,它主要体现在:(1)国际经济组织的监控、协调、管理职能大大加强;(2)世界、地区及双边的政府间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上升。宏观经济管理全球化,需要新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有经济学家提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只与政府间金融活动有关,而对国际范围的私人金融活动却缺

乏必要的监控体系与办法,很不适应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不仅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必须加强政府间的协作,建立和完善国际协调组织,而且,针对目前世界范围的高失业率问题,也应当考虑建立类似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那样的国际性收入协调组织。否则,目前各国这种为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而竞相压低成本的竞争,将使失业更为严重。在国际贸易与投资方面,由于WTO等的努力,关税壁垒对贸易的限制日趋缩小,但是,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却对公平竞争构成新的威胁。因此,在OECD等国际经济组织中如何协调各国的竞争法,以限制跨国公司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对竞争秩序的破坏,也是亟需考虑的政策问题。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争取建立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参与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及管理合作,其重要性不断提高。如何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和相对公平的竞争条件,是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课题。而他们在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的发言权,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及管理合作中的影响力大小,归根结底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国力,而这又建立在本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升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增加有效供给的供给管理政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全部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Paul Streeten. "Globalization: Threat or Salvation?" A. S. Bhalla ed. *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Marginalizati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 [2] Padma Mallampally and Karl P. Sauva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inance & Development*, March, 1999.
- [3] OECD. *Globalisation of Industry: Overview and Sector Reports*. Head of Publications Service, OECD, 1996.
- [4] Deepak Nayyar. "Globalization: The Game, the Players and the Rules". Satya Dev Gupta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 [5] 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 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R].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1997.
- [6] 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 1995年世界投资报告[R].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1996.
- [7]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1999.
- [8] John H. Dunning and Khalil A. Hamdani. eds. *The New Globalism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9] 约阿吉姆·比胡夫. 全球化——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分析[A]. 张世鹏,殷叙彝编译.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10] OECD. *The OECD Report on Regulatory Reform*, Volume I: Sectoral studies, OECD, 1997.
- [11] 乌布利希·贝克. 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A]. 张世鹏,殷叙彝编译.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沈小波]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OECD评论员,柏林自由大学教授 E. 阿尔瓦特(Elmar Altvater)博士在柏林与笔者座谈时提出了上述意见。

The Value Stand of Sociological Studies

by TONG Min

Abstract :Anti-positivist sociology , contrary to positivist sociology , maintains that ethic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Its ethical stand is , however , not firm and thoroughgoing , as it divides the study into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ethical evaluation , which constitutes a part of the ethical stand of positivism. In order to free sociological study from the anti-ethical stand of positivism , ethical stand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ociological study and ethical evaluation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only way for human beings to understand their life.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practice , which is the base of the ethical stand , influences human beings by way of ethical difference and ethical dignity.

Key words :ethical stand , ethical evaluation , ethical difference , ethical dignity

Adorno 's Philosophy of Modernity in the Post-Modernist Context

by YANG Yu-cheng

Abstract :Adorno believes that the dilemmas of modernity essentially originate in the instrumental control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over nature and humanity and the repression of identity thinking upon what is contingent and particular. His negative dialectics resist the compulsion of identification inherent in all conceptual thought by continual self-reflection upon the inadequacy of such thought. His inquiry into modernity of art is an attempt to seek new models of thinking and cognition without oppression. His criticism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and identity thinking resonates among postmodernists. His inquiry into new models of reason and cognition contributes to avoiding some theoretical mistakes of postmodernists. Therefore , he is more of a criticizer of modernity than a postmodernist.

Key words :Adorno ,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 identity , modernity , postmodernity

Local Business Tax in the Early Years of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Dynasty

LIN Fe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Wanli (1573-1620)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ota of local business tax and the level of local business lacks coordination in provinces. It is obvious in two aspects. First , in most provinces the states of the level of business and the quota of local business tax do not match. Secondly , the level of business in provinces and the quota of local business tax do not match. The main cause for this phenomenon is that the narrow scope of taxation leads to the quota of local business tax in a general low state. It brings about , to a large degree , the division of the quota of local business tax in provinces and the level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The retention of the tax quota of the Song Dynasty is another cause for 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quota of local business tax in provinces and the level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Key words :Wanli period , business tax , level of business development